

不同的個案將社會變化不同的模式呈現出來，然而，這些各有差異的模式背後都遵循着同一社會變化機制，各社區的文化展演都具備着共同的特質。雖然這本論文集跳脫窠臼，提供了關注和研究變化的案例與經驗，但書中收錄的文章都聚焦於少數族群，不論是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，還是新都市移民，又或是臺灣的原住民、越南的儂族。社會中人數更多的群體被忽略，反映了當前研究的局限。

楊梅  
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系

**吳滔、佐藤仁史，《嘉定縣事——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316頁。**

近十餘年來，江南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日趨細化，以一府、一縣，甚至一鎮為專題的研究專著已頗可見於學界。因此，就個案研究積累的層面來說，針對一縣的案例研究絕不缺乏。但是，如果在針對個別區域的研究中，努力把握整個江南歷史演進的邏輯，乃至為社會經濟史與歷史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啟示，那麼這樣的研究則是彌足珍貴的。

在江南史名宿森正夫前輩為《嘉定縣事》一書所做的序言中，對這種努力做了最懇切的把握與讚許。在森正夫先生的序言及吳滔所撰寫的緒論中，都特別提及了「納布折漕」與「夫束」對嘉定歷史的特別作用。他們將賦役制度視為本書寫作的第一條線索，尤其是賦役制度對市鎮發育的影響，無論從社會經濟史或歷史地理學來看，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創獲。本書的第二條線索也正是江南市鎮的形成與發育機制。江南市鎮的發育是非均質的、非勻速的這一點，是吳滔與佐藤仁史在研究中特別強調的。

本書的內容可以拆解為三部份。首先是第一章說明了嘉定特別的賦役問題「官布折漕」。嘉定由於地理形勢的原因，並非糧食產區，但在明初卻承擔高額的漕米。經過周忱改革，嘉定承擔的漕米轉為交納官布，當地的棉布生產、交易由此得到了發展的契機。但是，在此後江南普遍的賦役改革，尤其是折銀改革中，由於嘉定已經進行過折布的改革，成為改革的遺忘角落或特例，反而處於不利的位置。這樣，由明初的官布折漕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一直延續到清末。當地人則編纂了文獻集《折漕彙編》。

此後的兩章分析嘉定各市鎮在這一制度背景下形成、發展的動力與機制。第二章中，作者解釋了明代中後期市鎮形成與賦稅的關係，認為由於賦役的調節，不同稅賦負擔的區域會相應地調整產業結構，若干專業棉業市鎮的興起與此有關。一方面由於生態環境的變化，嘉定及昆山北境已經轉變為更適於種植棉花的區域，但稅收仍然堅持徵收本色漕糧；另一方面，周邊如常州這樣適於糧食種植的區域，卻徵收布匹。在這種賦稅結構的驅動下，不同經濟作物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就成為必然的趨勢。從形成時間以及主要貿易物（標布）來推斷，安亭、陸家濱等市鎮都是在這樣的契機下興起的。

第三章分析南翔的「因寺成鎮」說的意義。重點探討了早期市鎮的形成動力，強調寺廟雖然在早期市鎮空間形成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，但並非此後市鎮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，驅動市鎮發展的仍是前章所強調的由賦役變革帶動的棉布市場發展，而市鎮之所以始終圍繞南翔寺發展，是因為南翔寺本來就處於聚落空間的最優地理位置。

第四章涉及的是由賑濟事業所觀察到的「地方自治」的發展。本來是作為賑濟區劃的「廠」，在此後被不斷附加其他的功能，共同商議賑濟事務的「廠董」也由此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整個的地方公共事務當中。第五、六章所討論的內容核心都是地方經費問題。「夫東」本來是疏浚河道的徭役，佐藤仁史利用《疁報》為核心材料，說明了當地有關「夫東」改革爭論中的核心利益是什麼，其背後又是怎樣的人群互動關係。

總的來看，本書的章節安排大致按照年代順序，並且也包含着以下的意味：首先敘述作者所認為的嘉定市鎮變革的重要動力——宣布折漕，之後敘述市鎮變革機制的幾種不同類型，再次說明從市鎮的立場來看的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，最後則介紹核心材料《疁報》。

不過，按照佐藤仁史在〈後記〉中的交代，〈附錄〉中介紹《疁報》的文章其實是最早寫成的，因而也可以由此推測：本來是因為發現了《疁報》這一極具價值的材料，由此關注到清末地方自治中的言論與政治動向，夫東則是連接地方利益與國家財政之間的一個關鍵，因而自然也就成為討論的焦點。而吳滔有關賑濟分廠的研究、南翔鎮的研究，都與他本人此前對於蘇州城鄉關係、荒政問題的關心一脈相承。

吳滔與佐藤仁史分別對賑濟分廠、公款公產與「夫東」的研究，都可視作針對清末地方自治這一議題的關心。荒政問題是吳滔在1990年代就已經關心的問題。在他早期的荒政研究中，關心社倉、義倉等主題，與農史、農業社會再生產等議題關係較緊密，而針對嘉定賑濟分廠的研究，所關心的問題

則已經延伸至賑濟事務所具有的公共性。也就是說，由於明確賑濟責任的需要，以賑濟責任劃分為基礎的「區域」出現了，當地的士紳也對這樣的「區域」形成了認同感，並進而影響到民國之後次縣級政區的變動。

賦役制度如何影響市鎮與地方區劃的發育？這似乎是作者在本書中強烈關心的一個問題。在有關賑濟、廠區劃分的研究中，經過作者的梳理，其中的變化邏輯已經清晰可見，肇肇為一定論。而在賦役、水利與明代市鎮演變之間的關係中，這一邏輯似乎還在若隱若現之間。

江南市鎮如何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興起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話題，因為關涉到如何評估17至19世紀江南的市場發育及所謂城鎮化問題。老一輩江南史學者雖也曾考慮到賦稅因素的影響，但能予以直接證明的證據可以說幾乎無法尋覓，在江南市鎮研究中不能不留下一個遺憾。吳滔在針對安亭、陸家濱的案例研究中也指出，在此前研究中還未曾找到直接說明市鎮如何形成的機制的材料（頁63）。

為推斷安亭、陸家濱的情況，吳滔援引了謝湜在高鄉糧長研究中的關鍵材料《璜涇超市碑記》，從中可以看到，新興市鎮形成中，貿易空間（店鋪、橋樑）以及有力的地方勢力（主姓）具有重要作用。作者在研究中援引的案例更像是豪強的形象，在控制聚落的權力同時，也試圖發展聚落的經濟。但是，這一線索似乎仍然不是由賦稅驅動區域間經濟交換的直接證據。

在總的時代背景中，具有類似經濟形態的安亭、陸家濱被認為也具有類似的歷史進程。接着，吳滔抓住「標布」這一關鍵字，指出陸家濱鎮上所進行的布匹貿易顯然是運往北方。這類標布生產也與賦稅徵收具有或明或暗的關係。因此，儘管我們仍沒有證實安亭、陸家濱等市鎮的興起與賦稅結構驅動的商品交換的直接有關，但基於對當地的經濟形態的判斷的合理邏輯鏈條建立起來了。

在我看來，利用水利、植棉、標布貿易、改折多個因素構建出明代江南「專業市鎮」興起的邏輯鏈條，是本書最具魅力也最具挑戰性的一個分析框架。從這一思路出發，白銀、消費、地方行政等議題在江南區域史的敘述中都有可能得到新的理解。同時，這一邏輯鏈條上仍然有若干環節有待新史料予以充實，另一方面，這也意味着原有史料可能在這一新的提問路徑中發掘出新的價值。江南區域史研究的進一步推進，或可有期於此。

趙思淵  
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